

西方福利国家的双重化改革及其衍生后果

冉昊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始终在扩大,却又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不致使社会发生动荡。其原因在于:福利国家的市场化或私有化改革,绝大部分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并随之出现了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在分配系统领域,政府的二次分配力度始终在加强,由此为平民提供了基本社会兜底和保障,从而使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始终保持在可控区间,不至引起社会动荡。基于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福利国家双重化改革衍生的后果,主要包括民主福利陷阱、阶级冲突螺旋上升、民粹主义思潮复燃和未来的公私混合改革趋势。

关键词 西方福利国家改革;贫富分化;生产系统;分配系统

中图分类号 D7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0)01-016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ZZ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81003)

近年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金融风暴、欧债危机、“黑天鹅”事件不一而足。出现这些新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引起不同阶层的普遍不满。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仍然在持续扩大,但群体性事件(不包括伊斯兰国制造的恐怖袭击)较少发生,针对政府的大规模游行集会也并没有超过以往的强度和范围。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西方福利国家出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又是什么机制能够使其产生的社会不满能始终被维持在理性范围?本文试图以生产—分配为视角,重新解释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其衍生后果。

一、关于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的传统观点

何谓福利国家,一般而言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地域界定。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由于其政府历来奉行高福利和高社会保障政策,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然而近年来,北欧有些国家进行了削弱福利的市场化改革,因而这种界定存在一定问题。二是以执政党派界定。由欧洲传统的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党^①执政的国家,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然而近年来,很多这类国家的执政党——社会党——纷纷下台,改由其他中间党派或右翼党执政,因而这种界定也存在一定问题。

基于此,本文倾向于第三种界定,即以权力结构和国家组织形式来界定。英国牛津大学沃斯特学院原院长艾萨·布里格斯给出了基于这种界定形式的经典定义:“福利国家就是其组织权力通过政治和行政专用于调适市场各方力量竞赛(play of market forces)的国家组织形式。”^[1](P16-29)换言之,在确保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政府对市场进行国家组织形式的有序干预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属于福利国家。

^① 关于欧洲国家社会党的称谓,因不同国家历史渊源不同有所差异。有的带有社会标识,如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有的不带社会标识,如英国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波兰左派联盟等。

因此,由这一国家组织形式构成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典型的代表——也就是本文界定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即 OECD 国家,尤其是最早的 20 个成员国。该组织可以追溯到 1960 年,当时的成员国为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联邦德国 18 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①。这些国家大都是较早进入工业化、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也是较早建立高福利保障体系的国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福利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广泛且影响深远的改革。关于这场改革,传统观点认为,西方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改革,核心是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市场化改革。对这一传统观点,有两种不同分析路径。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析路径。福利国家改革本质上反映的是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逆袭。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 10 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政治特征,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复燃,由此,政府的施政行为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种逆政府扩张趋向^[2](P4),经济上表现为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胜利^[3]。二是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路径。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实质就是市场化或私有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和范围大幅缩减,其代表是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实验”的英国私有化改革,具体方式是通过产业政策的私有化,证明“凯恩斯主义的崩溃”^[4](P112,120,132)。自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右派”纷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的加速进程^[5]。国内相关研究多采用这一研究路径,在政府—市场关系基础上,构建了福利主义大政府和自由主义小政府的对立二分概念^[6],并把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私有化改革与中国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进行比较分析^[7]。

福利国家改革核心是市场化改革这一传统观点,最直接的论据是,西方福利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以来,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在美国,如果加上资本带来的收益,1% 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占全国财富的比例自 1980 年起已经翻了一番,大致从 10% 提高到 2009 年之前的 20% 以上;最富有的 0.1% 的人群,其收入比例从 1980 年起至今更是翻了两倍,大致从 4% 左右提高到 2009 年之前的 10% 以上。更甚者,财富总量的前 0.01% 人群——大概有 16000 个家庭,平均收入超过 2400 万美元——其收入比例自 1980 年以来翻了两番,从 1% 涨到了将近 5%^[8]。企业首席执行官和一般工人的工资比,从福利国家改革前的 30 倍扩大到 2000 年之后的 300 倍^{[9][10]}(P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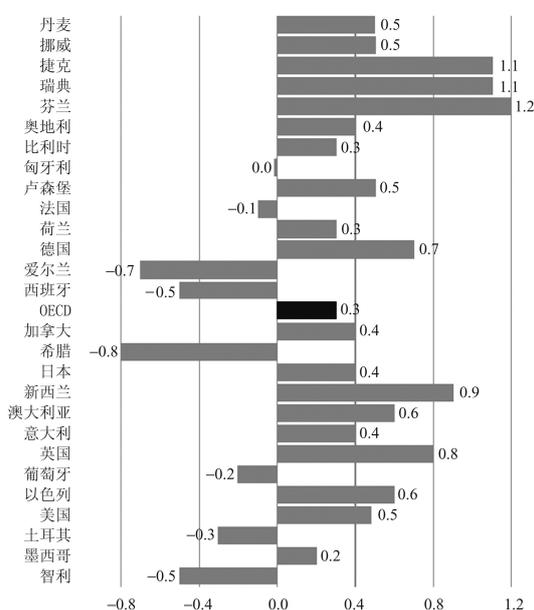
如果把视线扩展到西方福利国家的主要构成——经合组织成员国,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成员国即当今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其基尼系数变化率都为正数,即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而少数基尼系数变化率为负数的国家——法国、爱尔兰、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土耳其和智利,其中爱尔兰、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虽为福利国家,但却是 2011 年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欧猪五国”中的四个,政府已经因为高昂的福利造成偿债困难、濒临破产;土耳其和智利不属于传统西方福利国家之列;只有法国属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见图 1)。这充分说明,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普遍而持续地在扩大。

二、重新理解市场化多局限于生产系统领域的西方福利国家改革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是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最重要表现之一,但进一步思考则会发现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如果市场化改革果真是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全部主题,西方政治精英们又如何甘愿容忍贫富差距的始终扩大而放任不管?由此,我们进一步质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西方福利国家改革果真是以市场化或私有化为主导的改革吗?

研究发现,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或私有化改革绝大多数只发生在生产系统,市场化或私有化在分配系统不仅没有明显推进,相反,政府正扮演着比改革之前更加积极的角色,改革进程呈现了一种混合态势。

^① 资料来源:OECD 组织官网.[2019-05-27]. <http://www.oecd.org/general/organisationforeuropeaneconomicco-operation.htm>.

图 1 OECD 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基尼系数变化率^①

自由市场和国内贸易发展均衡的前提之下,在全球拓展自由主义贸易渠道。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之趋势,原本具有国家特质的嵌入性自由主义体系已不再适应全球化的进一步开展,因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劳动分工和减少关税壁垒等措施,逐步替代了之前的嵌入性自由主义,各国的政府角色权重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系统内不断降低,西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市场化趋势在国际维度显著加强。这些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市场化表现均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而鲜见于分配系统领域。

国内维度而言,西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市场化体现为政府—市场关系中各自的角色与功能界限日益明晰,由此,代表市场功能的生产系统和代表政府角色的分配系统之间的功能差别也日益明确,使市场化集中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

其一,以英格兰历史文化为宗的前英殖民国家或英联邦国家,其政府—市场关系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模式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市场经济制度最发达,具有生产系统发达度高、市场化改革覆盖面广的特点。如英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主导的私有化改革。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场针对福利国家福利过高以致影响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全面私有化改革。事实上,英国的这场私有化改革主要集中在生产系统领域,在分配领域不仅没有私有化改革,反而是更加强了政府干预。之所以会出现所谓改革全盘私有化的误解,是因为传统研究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各自功能差异的认识不足。在英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制度高度发达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小政府—大市场格局早已健全,其生产系统较为发达,涉及面更广,这就误让人以为其市场化改革是全方位的,而忽视了市场化或私有化绝大多数只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再如美国,由于具有同英国类似的政府—市场关系,其社会福利供给相比于其他 OECD 国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故被称为美式例外主义——即美国是福利国家里面制度和福利供给上的例外——市场经济制度发达和福利供给水平较低^[12]。因此,同样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改革,也并非全方位的私有化改革,其市场化或私有化绝大多数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

其二,以德国^②和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其政府—市场关系表现为政府和社会介入市

① 资料来源:Provisional data from 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database (2017-05-28).<http://www.oecd.org/els/social/inequality>.

② 此处及后文出现的德国,统指原联邦德国以及两德合并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理论上佐证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多限于生产系统领域的,是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希冀在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重新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在保证市场自由运转的前提下,强调政府对市场调控的积极作用,继续改进并完善福利国家。它确保了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方向改革多限于市场自发运转和调配的生产系统领域。

现实上佐证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多限于生产系统领域的,是这些国家生产系统在国际与国内两个不同维度的市场化趋势。

国际维度而言,西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市场化体现为福利国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交往中全球化的全面铺开。早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所谓的嵌入性自由主义^[11]战略,即全球化的第一步,基于保护本国贸易、实现国际自

场程度较高的欧洲大陆法团模式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模式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政府和社会介入度高、改革的公私领域混合性高的特点。如德国的市场化改革就具有市场化和福利化相混合的特征。在生产系统领域内,一方面,企业所有权大幅市场化或私有化,并由此导致企业产权性质的变更;另一方面,企业的福利供给市场化引起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进一步导致劳动力技术变迁,从而使雇主激励条件发生变化,再进一步引起社会保障制度变化——这一系列连锁的市场化(包括企业的福利供给)都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而非发生在分配系统领域。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西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市场化,要求用市场的手段通过初次分配来调适社会不平等,因而在这个阶段,不涉及分配系统二次分配的干预,其市场化改革措施也无需借用分配系统的手段。但是,生产系统的市场化改革效果并不彻底,因为初次分配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会不断强化贫富分殊的现状,却不会对此有所遏制,于是西方福利国家改革如果仅仅停留于生产系统的市场化,也是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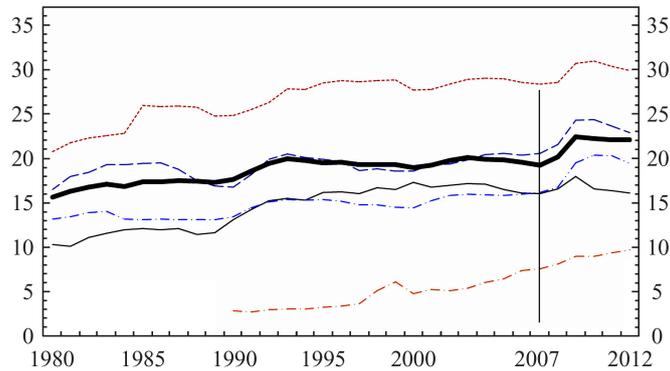
此外,通过政府—市场关系的各自功能划分来研究西方福利国家市场化改革多局限于生产系统领域的研究方法,还包括其他分类方式,如将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市场经济模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模式等^[13]。但总体划分类型相似,即以政府—市场关系为基本依据的划分。无论如何划分都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进行的一系列较为广泛的私有化改革,包括加速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流动、在企业融资方面更加强调金融市场融资手段而非银行融资手段^{[14][15]}、政府放松原料供给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管制以确保价格机制协调作为市场主导等,多限于发生在福利国家生产系统领域,而不包括分配系统领域。

三、西方福利国家分配系统的非市场化与贫富调节

如果仅仅解释西方福利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多局限于生产系统领域,那么显然还是停留在表面。因为我们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但为什么这种贫富差距始终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因而很少发生暴乱,且秩序井然?这就必须分析西方福利国家的另一个系统——分配系统。

不同于生产系统的市场化,分配系统呈现出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图景。19世纪末俾斯麦第一个在德国建立了准社会保障体制,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在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大本营、以拉斯基为代表的费边主义影响下,依据《贝弗里奇报告》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其他OECD国家也受该思潮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大力发展公共福利,为社会边缘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逐步建立起一张社会保障网。传统研究更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石油危机、经济滞涨和人口老龄化等多重压力下,西方福利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或私有化改革,通过大力削减福利开支、缩减政府干预,试图维持福利国家政府的正常运转。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一系列市场化或私有化改革多局限发生在生产系统领域;与此同时,分配系统领域的改革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只是被忽视掉了——分配系统领域迥然不同于生产系统领域的改革方向,使西方福利国家政府角色总体上发生了扩张。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分配系统表现为非市场化改革的趋势。例如,在公共品供给领域,福利国家政府的二次分配在加强。就整体情况而言,通过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OECD国家公共社会开支的变化情况(见图2)发现,公共开支占GDP百分比始终在上升。这表明,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并非只有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还有非市场化的改革,它主要发生在分配系统领域。这种福利供给不断扩张的基本态势,被一些学者称为福利的调适,而绝不是传统研究认为的福利的紧缩^[16](P410-456)。

图 2 1980-2012 年间 OECD 主要国家公共社会开支占 GDP 百分比变化^①

资料来源: OECD iLibrary (2016-07-20)

其二,西方福利国家中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国家,分配系统领域的二次分配在不断加强^[17](P684-698)。如英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起始终在增加,并且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的增幅大于 GDP 的增幅^[18]。此外,在其他社会政策方面,如家庭和儿童政策,英国政府的改革更趋向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福利政策,福利供给面有了较大延展;在私人养老金市场的管制方面,政府的二次分配功能也在加强。

其三,西方福利国家中欧洲大陆法团模式的国家,其分配系统领域的二次分配也在不断加强。比起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模式的国家,欧洲大陆法团模式国家的改革具有更加混合性的特征。如德国的失业保险既不由国家也不由纯利益驱动的企业提供,而是由复杂的法团提供。公私领域间的转移则依据干预模式的不同来设置。政府减少公共供给,但同时,政府有可能引入强制性的私人供给或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供给者,并在严格的公共管制框架下进行管理。这说明,在混合型福利改革的背后,政府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这个角度上说,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不是缩减福利的改革,而是保卫福利的改革^[19](P232)。

概言之,西方福利国家贫富差距数十年来能持续扩大却始终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未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崩溃,其重要原因在于分配系统领域二次分配的不断扩张和政府角色的不断加强,给普通阶层的平民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张。由图 3 可知,近年来即使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但与其他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相比,西方福利国家的贫富差距仍然比较小,始终维系在可控范围内。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分配系统的非市场化改革以及由此形成的二次分配的加强和政府角色的扩张,功不可没。

四、西方福利国家双重化改革的衍生后果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生产系统市场化与分配系统非市场化之间,构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政府—市场的二元逆向运动,这一具有双重化特征的改革会导致一系列衍生后果。

一是生产—分配体系下随着公民社会权兴起而产生的民主福利陷阱。公民权利的兴起与福利国家生产系统的市场化密切相关。正是因为生产系统市场化伴生了贫富分化,使政府对保护贫穷阶层和弱势群体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其直接体现就是公民权利的发展,从民事权到政治权再到社会权^[20],它代表了政府对公民权利保护内容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代表民事权利的言论权和财产权,到代表政治权利的选举权,再到代表社会权利的各种基本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社会权,又曰社会公民权,是公民权利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公民不论身份皆享有福利平等的权利。如果没有生产系统市场化和贫富分化的出现,公民权利绝不可能发展到这个阶段;但如果只有生产系统市场化,那么提升公民福利就无从谈

^① 注:右侧纵轴由上至下分别为:法国;英国;OECD 平均水平;美国;澳大利亚;韩国。

起——对公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提升是由政府在分配系统领域通过二次分配来进行的。西方福利国家多数实行民主政治制度,随着公民社会权的兴起,福利国家扩张给民众带来了基本福利保障,吊起了民众的胃口。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不惜对选民许诺更高的福利保障,以此获得更多的选票。然而,一旦当选,政治家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兑现选举承诺,势必要大幅增加政府在福利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然而这些福利国家政府往往由于以往长期的高福利政策导致财政捉襟见肘,一旦大幅增加公共开支,可能使政府破产;另一方面,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不兑现选举诺言,当选民发现自己投票选举上台的政治家欺骗了他们,则会在下次选举中改换门庭、另投他人,最后执政者也不得不以下台收场。2011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猪五国”领导人全部被迫辞职或选举下台,就是最好的明证。可见,西方福利国家生产系统市场化虽然推动了公民权利的发展,并通过分配系统二次分配的加强使公民社会权得以实现,却也为民主福利陷阱埋下了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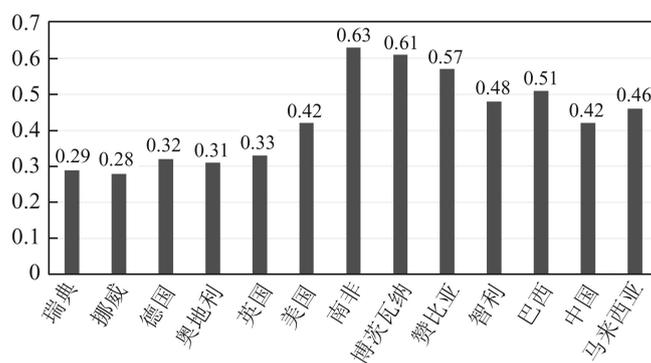


图3 2010-2017年西方主要福利国家与其他国家基尼系数均值比较^①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数据统计(2019-05-27)

二是生产—分配体系下阶级冲突的螺旋式上升。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福利国家体系中一对重要的关系——劳资关系,视为具有冲突性的阶级关系。在生产系统市场化作用下,西方福利国家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使劳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打破了原有阶级关系的平衡。升级后的阶级冲突导致了福利国家劳资双方权力资源的重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分配系统的二次分配作用加强,通过提高社会保障等措施缓解劳资之间日益悬殊的不平等——阶级冲突因此得以缓和。但是,不断增强的二次分配以及不断扩张的福利供给,必然会引起劳资双方为争夺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而引发的新的不平衡,从而导致更强烈的阶级冲突。于是,缓和阶级冲突的解药最终却成为引发新一轮阶级冲突的导火索——阶级之间的进一步隔阂与裂痕由此变得不可避免,进而形成阶级冲突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三是生产—分配体系下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叠加冲突导致民粹主义思潮的复燃。如果说生产系统的市场化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分配系统的非市场化和二次分配功能的加强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那么两个系统之间逆向运动的张力将有可能带来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叠加冲突。新自由主义倡导政府扮演守夜人角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论者则呼吁“找回国家”,强调国家的主体能动性影响社会变迁^[21],希望通过政府干预避免市场失灵。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衍生出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此外,还有基督教民主主义等中间偏右的意识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福利国家理论正是在上述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交叠中进一步发展。然而,这些早年不断演化的意识形态,虽然从指导思想进一步丰富了福利国家制定多元化改革政策的可能性,但却始终无力应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亟待解决的各种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反而引发了普通群众对福利政策口号式宣传的反感。正如福山指出,中产阶级随着经济状况

^① UNDP: Income Inequality, Gini Coefficient. <http://hdr.undp.org/en/indicators/67106#a>.

的恶化开始积累不满情绪,催生出自己心中国民意识的那片领地被外来者占据^[22]。既然既有意识形态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其他迎合群众求变思想的意识形态思潮就可以取而代之——民粹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死灰复燃的。

可以说,民粹主义思潮的复燃,是基于多种意识形态交叠的福利国家改革始终未能在生产—分配之间取得有效平衡,迫使普通选民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思潮来指导福利国家改革。其先兆是2012年伦敦骚乱事件。其时执政的英国中右翼党派保守党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如“大社会”改革,不仅没有实现福利的普惠化,反而缩小了福利覆盖面,引起底层民众不满,引发民粹风潮。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法国民众纷纷穿上黄背心,形成大规模群众集会抗议和骚乱。表面上看,民众抗议的是油价上涨,实质上是对法国长期以来削减福利改革的不满。随后,当这场民粹主义运动蔓延至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爱尔兰等欧洲福利国家时,示威者抗议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养老、税收和就业等福利保障问题——传统意识形态许诺的福利空头支票,某种程度上让中低收入阶层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改革丧失信心。

四是生产—分配体系下未来西方福利国家的公私混合改革趋势。根据本文的基本论点,如果说近几十年西方福利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集中于生产系统领域,同时伴随着容易被忽视的分配系统领域的非市场化改革,两个系统的改革方向各异,那么未来这些国家改革则很可能朝着混合性趋势进行。具体表现为:打破现有的生产系统市场化、分配系统非市场化的基本模式,实现生产—分配跨系统间的混合改革。例如,在某一领域(未必只是生产系统)的私有化可能伴随着另一领域(未必只是分配系统)的政府加强干预。在一些福利国家改革中,筹资和服务供给领域的私有化改革,可能同时伴随着管制领域的政府干预的加强^[23](P211-221)——前者可能属于分配系统领域,但仍然出现了私有化。在另一些福利国家改革中,养老金管理和失业政策朝着市场化和私有化方向改革,而社区救助政策则增加了政府的开支,同时政府采用第三方购买服务,引入社会资本——对此,养老金和失业政策属于分配系统领域,却出现了市场化改革;社区救助政策同样属于分配系统领域,但出现了加强二次分配与引入社会资本的公私混改特征。正因如此,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福利国家改革不是简单地膨胀或收缩,而应被理解为不同的干预模式发展的混合福利改革^[23](P211-221)。更进一步说,西方福利国家正是在深植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中两个系统的双重合力作用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因此,打破既往对福利国家改革仅仅是市场化的单线思维理解,认识到改革的混合性与多重性,对正处于改革深水期和攻坚期的我们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A. Briggs. *The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 Pierson and F.G. Castles. *The Welfare State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 [2] 弗朗西斯·福山. 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黄胜强,许铭原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3] R. Gilpin R.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 皮特·霍.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刘骥,刘娟凤,叶静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 [5] 皮特·普雷斯顿. 发展理论导论. 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6] 秦晖. 权力、责任与宪政——关于政府“大小”问题的理论与历史考查. 社会科学论坛, 2005, (2).
- [7] 姚建平. 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化、私有化发展问题研究——以中、美比较研究为视角. 理论导刊, 2007, (7).
- [8] For Richer, For Poorer. *Economist*, 2012-10-13.
- [9] P. Genschel.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Retro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4, 11(4).
- [10] 张夏准. 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 孙建中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
- [11] J.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

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36(2).

- [12] S.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London: Norton, 1996.
- [13] P. Hall and D. Soskice.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P. Hall and D. Soskic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4] D. Verdier.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Banking in OECD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0, 33(3).
- [15] D. Verdier. State and Finance in the OECD: Previous Trends and Current Change.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0, 28(1).
- [16] P. Pierson. Coping with Permanent Austerity: Welfare State Restructuring in Affluent Democracies//P. Pierso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7] H. Glennerster. Welfare Reform//M. Flinders, A. Gamble, C. Hay and M. Kenn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British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8] M. Seeleib-Kaiser.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8.
- [19] C. Pierson.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Welfare*. London: Polity Press, 2006.
- [20] T.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C. Pierson and F. Castles. *The Welfare State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 [21]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for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P.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2] 弗朗西斯·福山. 民粹主义动摇民主根基. 参考消息, 2019-05-27.[2019-07-09]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9/0527/2381298_2.shtml.
- [23] M. Seeleib-Kaiser.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M. Seeleib-Kaiser. *Welfare State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The Dual Reform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Ran Hao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bstract The rich-poor gap in Western welfare states has been widening since the 1980s, yet it remains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without causing upheavals or cris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view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st of the marketization or privatization reforms in western countries take place in the production field, leading to a gradual widening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yet the redistribu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domain has been enhanced by the government to offer a basic social protection for ordinary people so that th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mains controllable without upheavals or crises. The consequences of welfare state reforms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domains, however, include the democratic welfare trap, the spiral increase of class conflicts, the revival of populism as well as the trend of “public-private” mixed reforms.

Key words Western welfare state reforms; rich-poor disparity; production regime; distribution regime

■ 收稿日期 2019-05-17

■ 作者简介 冉昊, 政治学博士,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 北京 100091。

■ 责任编辑 涂文迁